

宝鸡石鼓山三号墓研究*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关键词: 石鼓山 M3, 时代, 族属, 高领袋足鬲族群,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 列簋

摘要: 本文通过五个方面的分析, 认为石鼓山 M3 的时代可进入康王初期, 葬制、葬俗、器物“西土”风格浓郁, 墓葬等级属仅次于诸侯一级的高等级贵族, 铜器上族徽反映了复杂的族系关系。此外, 墓葬体现出高领袋足鬲族群在商末周初主要向周人故土发展, 布防西部边境, 而联裆鬲集团主要向关东发展的现象。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时代下限可进入西周, 其在周初为西土集团高等级贵族服务。同时, 石鼓山 M3 还展现了西土集团列簋制度的雏形。

KEY WORDS: Tomb M3 of Shigushan, Date, Ethnicity, Ethnicity of joint-lobed *li* tripod, Bronze foundry at Southeast Xiaomintun, Sets of *gui* vessels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ive aspects of the tomb M3 at Shigush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omb should date to the early King Kang perio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burial system, funeral customs, and assemblages of burial goods all demonstrate a styl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group of Xitu (Western Territory). The occupant of this tomb should have a high social status, only one grade lower than the marquis level. More interestingly, the emblems on the bronzes show that the ethnic affiliation of the occupant was quite complicated. Ba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joint-lobed *li*-tripods represents the moving patterns of their users towards Zhou people's home territory, while the community using divided-lobed *li*-tripods moved eastward to the Guandong reg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erminus Ante Quem of the Xiaomintun bronze foundry dates to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might have been used to serve the high-elites belonging to the Xitu group.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tomb shows the prototype of the system using sets of *gui* vessels, which is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Xitu group.

2012年6月22日宝鸡石鼓山发现三号墓, 因丰富的出土物以及重要学术价值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墓葬材料刊布的同时^[1], 学界即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2]。然由于资料刊布时间较短, 相关问题仍需细化, 一些新问题也有待研究。因此本文拟对墓葬的时代、等级、族属、墓主身份, 高领袋足鬲族群集团的发展, M3铜器与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关系, 以及列簋制度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墓葬的时代

简报将墓葬的时代笼统地定在西周早期,

又说“上至商末周初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2013年的发掘又将墓地的时代定为商末周初^[3]。有鉴于此, 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墓葬的时代做一讨论。鉴于高领袋足鬲的时代尚存争议, 对于墓葬时代的讨论主要依据出土的铜器。由于该墓东、北、西各有2个壁龛, 其内出土铜器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我们先将出土铜器还原至各个壁龛(最小堆积单位)(表一), 然后再分别分析。

K1出土的扉棱鼎、乳钉纹簋都是周初器形, 器形相对略晚的鸟父甲鼎腹部较圆鼓, 腹部明显较先周末期的泮毛 M1 : 1 鼎^[4]浅, 时代应晚于后者, 其是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器形。同时,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亚洲中心项目“早期国家化历程中的东亚模式——以商周王朝为中心”(项目批准号: 2016 yyA05) 成果。

表一 石鼓山 M3 出土器物分盒统计表

盒号	K1 (3 件)	K2 (8 件)	K3 (16 件)	K4 (4 件)	K5 (无)	K6 (2 件)
出土器物	扉棱鼎 (M3 : 2)、 鸟父甲鼎 (M3 : 1)、 乳钉纹簋 (M3 : 8)	乳钉纹簋 (M3 : 3、 M3 : 7、M3 : 9)、 双耳乳钉纹簋 (M3 : 10)、 正鼎 (M3 : 5)、 万甗 (M3 : 6)、 戈戟 (M3 : 4)、 素面鼎 (M3 : 11)	斗 (M3 : 22、M3 : 100)、 禁 (M3 : 25)、2 号小方禁 (M3 : 21)、 户彝 (M3 : 24)、 单父丁卣 (M3 : 17, 内有 2 号斗、M3 : 15)、 曲臣先父癸爵 (M3 : 12)、 父癸尊 (M3 : 14)、 父甲壶 (M3 : 16)、 户卣 (甲) (M3 : 23)、 户卣 (乙) (M3 : 20)、 冉盃 (M3 : 26)、 亚羌父乙鬯 (M3 : 19)、 解 (M3 : 98)、 冉父乙卣 (M3 : 13)、 战斧	乳钉纹鼎 (M3 : 28)、 方座簋 (M3 : 27)、 戟 (M3 : 9)、 高领袋足鬲 (M3 : 29)、 中臣登鼎 (M3 : 81, 龕前, 疑出此龕)、 戈 (M3 : 62, 龕前, 疑出此龕)	漆皮之类	曲臣先父癸盘 (M3 : 31)、 重父乙卣 (M3 : 30)

集中出土“鸟”形族徽铜器的前掌大于屯村北墓葬^[5]时代也多在此阶段。K2 出土的 3 件菱格乳钉纹簋与 K1 出土的 1 件器形、纹饰接近，均与共出高领袋足鬲的泮毛 M1 : 2 簋接近，而明显早于张家坡 M106 菱格乳钉纹簋。有学者在对后两件研究时指出前者也见于西周早期墓葬中，而后者时代约当成康时期^[6]。因此 K1、K2 出土的菱格乳钉纹簋时代大致相当于周初或略晚。K2 所出时代较晚的为正鼎，该器器腹浅，分裆且三足细高，形制、纹饰与成康时期的旅鼎近同，因此时代也当接近。K3 出土铜器数量最多，器形纹饰也最有特点。从器形常见的几件分析可知，亚羌父乙鬯形制明显较相当于殷墟四期的榕树湾 M1 : 15 鬯^[7]晚，而与琉璃河 M1193 出土的成王时期标准器克鬯^[8]形制接近，时代当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父癸尊形制与竹园沟 M7 : 8 伯格尊^[9]接近，发掘者认为竹园沟 M7 的墓主主要活动在康王时期，其铜器多数也应在此时期，那么父癸尊的时代也应大致与此相当。冉父乙卣与琉璃河 M251 父戊卣^[10]形制接近，而腹部更加倾垂。琉璃河 M251 的时代相当于成康时期，所以冉父乙卣的时代也可能进入康王时期。K4 出土的乳钉纹鼎形制、纹饰与纸坊头 2003BZFM3 : 6 鼎^[11]较为接近，而器腹更加圆鼓，柱足更细，时代当为周初。方座簋腹部圆鼓，方座所饰大鸟纹

仅见于石鼓山墓葬，类似的纹饰有日本收藏的一对夔凤纹爵上的鸟纹，后者有专门研究鸟纹的学者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西周^[12]。此外，鸟纹虽然在商代晚期就有一定数量，但是左右对称作为主题纹饰是西周时期的新特点。K4 龕前出土的中臣登鼎与成王时期的标准器猷侯鼎形制、纹饰接近，两者时代也当近同。K6 出土的重父乙卣与 K3 冉父乙卣形制近同，两者时代也当接近。父癸盘与琉璃河 M251 伯矩盘形制、纹饰接近，时代当在成康时期（图一）。

通过以上分析，K1 内铜器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早阶段，K2、K4 铜器的时代基本为周初，K2 内只有正鼎的时代略晚。而 K3、K6 内多件铜器的时代可跨入康王时期。因此，我们认为石鼓山 M3 的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下限或可进入康王初年。

二、墓葬的族属和墓主身份

关于墓葬的族属和墓主身份，由于该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将结合葬制、葬俗、墓葬规模、出土器物的文化因素等多个方面予以讨论。

首先，葬制、葬俗方面，石鼓山 M3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墓主头向朝南，无腰坑及殉狗，这些特点都表明其并非殷遗民的墓葬。因为从目前的材料看，殷顽民在西周时期

石鼓山 M3				
	鸟父甲鼎	乳钉纹簋 (M3:7)	正鼎	亚羌父乙罍
其他地区				
	83 沔毛 M1:1 鼎	83 沔毛 M1:2 簋	旅鼎	克罍
石鼓山 M3				
	父癸尊	冉父乙卣	乳钉纹鼎	中臣登鼎
其他地区				
	伯各尊	琉璃河 M251 父戊卣	纸坊头 2003BZFM3 鼎	献侯鼎
石鼓山 M3				
	父癸盘	方座簋方座上凤鸟纹	户卣甲	
其他地区				
	琉璃河 M251 伯矩盘	夔凤纹爵上鸟纹	竹园沟伯格卣	

图一 宝鸡石鼓山 M3 与其他地区铜器时代对比图

仍然固守着腰坑殉狗,甚至殉人的传统习俗,这在鲁故城西周晚期的墓葬中仍然坚守,所以M3的葬俗展示出了不同于殷遗民的特点。此外,M3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墓葬多瓮,但是这一特点也基本只见于关中地区。M3东、北、西墓壁各有2个壁瓮,类似带瓮的墓葬已知西周早期主要有岐山王家嘴、凤翔西村、长武碾子坡、宝鸡戴家湾4个地点,前3个地点已知有王家嘴M20、01M1^[13],西村79M42、80M80^[14],碾子坡M1142^[15]共5座,戴家湾墓地因盗掘具体数字不明,但是据当时记录员的记录,该墓地有壁瓮且很多铜器就出自壁瓮是肯定的。此外,在已发掘的先周晚期墓地里,长武碾子坡墓地的139座墓里68座壁瓮^[16],同时高家村墓地有多座^[17],贺家村M1^[18]和76QH M124^[19]、崇信香山寺M1^[20]以及沔西毛纺厂M1也都带有壁瓮。也就是说在先周至西周早期,已知的带壁瓮的墓葬基本都发现于周原及以西以北的地区,最东至沔西。目前已知只有翼城大河口M1壁瓮墓不在这一地区,但时代不但略晚于石鼓山M3,瓮内出土物还多为漆器和原始瓷。所以壁瓮葬制当源自关中西部,其是“西土”的一些部族所特有的葬制。因此,葬制、葬俗两个方面都将M3框在了“西土”部族的范围。

其次,从墓葬规模以及出土器物的丰富程度看,石鼓山M3长4.3、宽3.6米,葬具两椁一棺,墓葬面积达15.48平方米,出土铜礼器31件,还有大量铜兵器和车马器。我们将之与同时期的其他墓葬进行对比后,等级情况逐渐明晰。琉璃河燕国墓地分I、II两区,I区规模最大的M52一棺两椁,墓葬面积9.46平方米,其南附属有2个车马坑,出有铜礼器6件,原始瓷器4件。II区不带墓道墓葬里规模最大的M251一棺一椁,墓坑面积达16.65平方米,出土铜礼器21件,同样食器、酒器、水器均有^[21]。泾阳高家堡戈族墓地M1时代商末周初,一棺一椁,面积6平方米多,出土铜礼器12件;M2时代略晚于M1,一棺一椁,面积6平方米左右,出土铜礼器6件;M3为成康之际,一棺一椁,

墓室面积5.28平方米,出土铜礼器6件;M4成康之际,一棺一椁,墓室面积约5平方米,出土铜礼器19件^[22]。灵台白草坡两座贵族墓时代相当于成康时期,一棺一椁,M1出铜礼器21件,M2出11件,但是墓室面积分别只有8.25平方米和6.7平方米^[23]。琉璃河墓地学界一般认为I区为殷遗民墓地,II区为姬姓部族墓地。高家堡为殷遗戈族墓地。白草坡两座均有腰坑。从墓葬规模和出土物看,石鼓山M3等级明显高于同时代的殷遗贵族,而与姬姓高级贵族等级相当。我们再与近旁的虢国墓地进行对比,宝鸡竹园沟M7时代为康昭之际,两棺一椁,墓室面积13余平方米,墓主伯格随葬铜礼器13件,妾随葬4件;M13时代报告认为康王前期,两棺一椁,墓室面积超过15平方米,墓主礼器22件,妾3件^[24]。石鼓山M3的等级似乎与虢伯相当。通过以上的对比(表二),我们发现石鼓山墓葬的等级明显高于同时期的殷遗民大贵族,其等级与仅次于诸侯一级的高级贵族相当。

再次,对各壁瓮内器物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石鼓山M3共6个壁瓮,除K5仅见漆皮痕迹外,其余均有器物出土。这5个瓮内,有多个瓮出有明显的“西土”风格的铜器。K1、K2内出3件相套的菱格尖刺状乳钉纹簋和1件双耳菱格尖刺状乳钉纹簋,这类铜器日本学者武者章认定是典型的当地土著系统青铜器^[25]。素面鼎与长武碾子坡红铜鼎(H1:1)风格类似,后者所属窖藏还出有乳状袋足鬲等陶器残片,碾子坡红铜鼎为西土集团铜器已有学者论述^[26],K2的这件显然是承袭了碾子坡红铜鼎的粗犷风格。毁兵习俗是周人的一种特殊葬俗^[27],K2的砸弯的铜戟正是这一习俗的体现。该瓮只有万鬲、正鼎似是外来之物。总之K2铜器体现了比较浓厚的“西土”风格。K4的情况同样明显,出土铜器只有1鼎1簋(中臣鼎疑出本瓮,不能确指),组合上为典型鼎、簋重食组合。同时,所出方座簋为周人常用器形,并被沿袭至东周。而这件方座簋上直棱纹的装饰,也在西周方座簋上常见,甚至周厉王自作之器猷簋腹部也都

表二 成康时期高等级贵族墓统计表

地点	石鼓山		琉璃河		高家堡			竹园沟		白草坡	
墓号	M3	I M52	II M251	M2	M3	M4	M7	M13	M1	M2	
椁棺	2 椁 1 棺	2 椁 1 棺	1 椁 1 棺	1 椁 1 棺	1 椁 1 棺	1 椁 1 棺	1 椁 2 棺	1 椁 2 棺	崩塌不明	1 椁 1 棺	
墓室面积	15.48 m ²	9.46 m ²	16.65 m ²	6 m ²	5.28 m ²	5 m ²	13 m ²	15 m ²	8.25 m ²	6.7 m ²	
铜礼器数	31 件	6 件	21 件	6 件	6 件	19 件	13 件(妾 4 件)	22 件(妾 3 件)	21 件	11 件	

采用了这样的装饰。此外，这件簠方座上的凤鸟纹也仅见于石鼓山墓葬，其与《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鸛鷥鸣于岐山”中“鸛鷥”的形象颇为类似，这都是“西土”风格的体现。此外，该龕出土了 M3 中唯一的一件陶器——高领袋足鬲。尽管联裆鬲、高领袋足鬲何为先周文化尚有争论，但是高领袋足鬲作为先周时期最重要的两类陶鬲之一的地位学界并无异议，其是关中西部商代晚期最常见的陶器之一。因此，高领袋足鬲的出土对于该墓族属的指向性非常明显。而且出土高领袋足鬲的壁龕 K4 还与该墓出土铜器数量最多的 K3 同处于墓葬的北壁，从位置上看，两龕的地位相同。K3 出土的铜方禁以及上面摆放的 1 件户方彝、2 件户卣的独特装饰风格也仅见于宝鸡地区。方禁目前仅见 3 件，其余 2 件均出自戴家湾墓地。其中石鼓山方禁正面的夔龙纹装饰与现藏天津博物馆的方禁^[28]基本相同，短侧与告田卣方座正面的纹饰极为接近。户方彝出戟的风格与现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戴家湾墓葬方彝^[29]特点近似，其上和 2 件户卣上的“鸭掌形”角与戴家湾出土的 2 件鼎卣、2 件凤鸟纹出戟卣^[30]特点一致，2 件户卣以及单父丁卣上的大鸟纹，特别是大鸟纹的三叉尾状冠饰与前面提到的戴家湾 4 件卣腹上的大鸟纹完全相同。同时，2 件户卣的形制、纹饰还与鼎卣相同，并且都是 1 件较高，另 1 件通过方座抬高从而达到与之基本近似的高度，差别仅在方座的纹饰略有小异。此外，K1 扉棱鼎与戴家湾出土的川鼎^[31]器形、纹饰近同，其齿状扉棱也应是宝鸡地方特点。因此，

这些铜器上的突出风格特点都应是宝鸡本地的。同时，填土中的 3 件釜铃以及墓内的 7 件歧形当卢也都是西土风格的代表器物^[32]。从以上分析可知（图二），K2、K4 内器物多是典型的“西土”风格器形，K1、K3 本地特点突出，只有 K6 的 2 件铜器可能是助祭或者馈赠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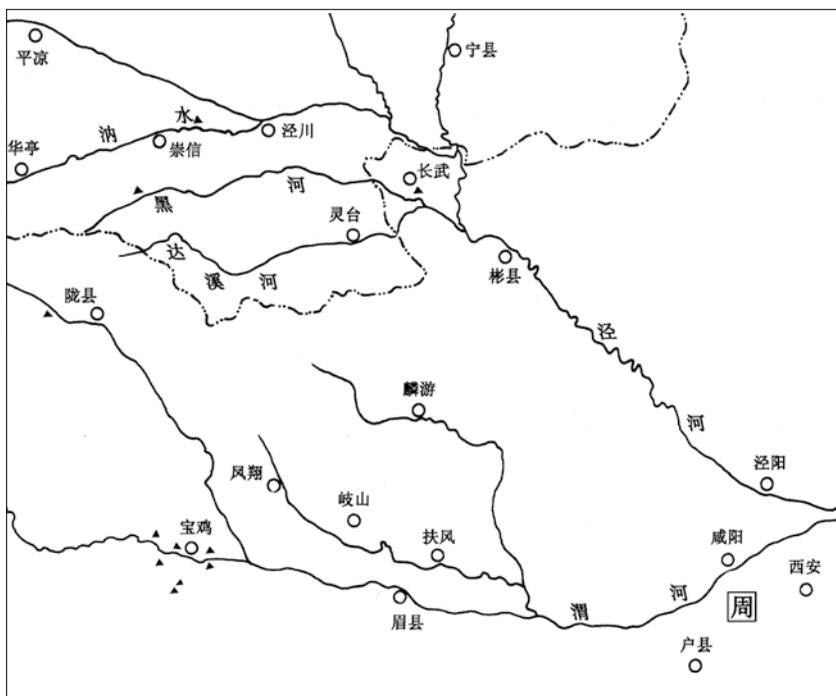
至于 M3 的墓主，当然解释“户”氏是很有道理的^[33]。因为其出自铜器最多的 K3 且族氏数量相对较多，同时摆放位置醒目、器形很具特点的 3 件铜器上的族氏均为“户”。但是该龕内族氏情况相当复杂，计有户（3）、冉（2）、亚羌（1）、单（1）、曲臣先（1）、（1）。“冉”为殷商大族，毫无争议。“曲臣先”族氏在 K6 还有 1 件盘，这种复合族徽并不多见。同样数量较少的还有“”氏。“亚”形族徽一般认为都是与商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国族^[34]，甚至有学者认为其与商王还有宗法关系^[35]。“羌”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长期与商王朝处于对峙状态，还出现在《尚书·牧誓》记载的助周伐商的队伍之中。但是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有了“册羌方”的记载^[36]，因此“亚羌”很有可能是所册“羌方”中的一支。所以以上族氏的身份都与墓葬各方面体现出来的“西土”风格不符，其不能是墓主首先可以肯定。“单”一般学者都同意文献《元和姓纂》卷四记载“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为甸内侯”，即单为姬姓的说法。但是商周时期作为族徽的还有龚妊媵甗铭：“龚妊媵甗。单。”“单”为妊姓者，以及“子单”、“大单”这样的复合族徽，并有学者认为是子姓



图二 石鼓山 M3 铜器文化因素对比图

之族者^[37]。所以单父丁卣^[38]上的单氏暂难定论。此外，它还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冉父丁卣器形、纹饰基本相同，特别是腹部的大鸟纹，都有三叉尾状冠饰，这也是 2 件户卣上的典型纹饰之一。而上博藏这件卣上是“冉父”的复合族徽，假如因器形纹饰的相同将两者相关联，加上该龕亦有 2 件“冉”氏的铜器，“冉”氏相关的铜器也达到了 3 件。若再由腹部独特的大鸟纹与“户”

器进行关联，其之间的族系关系就更加复杂。究竟“户”、“单”、“冉父”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现有材料似乎难以完全理清。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 K3 内族系问题复杂，而且一些氏族还与“西土”部族身份不符，表现出了和墓葬葬制、葬俗等方面不同的特点。如若单论“鸭掌形”角，郭家庄 M160 铜尊 (M160 : 52) 上还有一例^[39]。而类似 K2、K4 内器物则有着典型



图三 周王朝西部边境西周早期主要族群分布示意图

的“西土”风格。因此 K3 内多数器物很有可能是因为石鼓山 M3 墓主的地位，死后宝鸡地区的贵族和归附的殷遗贵族的助祭或赠贖物品。那么 M3 的墓主身份也就更加难以确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暂持谨慎态度。

三、高领袋足鬲及其族群集团的发展

石鼓山 M3 虽只在 K4 出土 1 件高领袋足鬲，但由于高领袋足鬲涉及到诸多学术问题，所以关于其年代、族属和族群集团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单独讨论。

高领袋足鬲的年代下限，此前学界多认为不能进入西周。原因除了出土高领袋足鬲的居址、墓葬材料少有确凿证据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迄今为止，尚不见一块高领袋足鬲的陶片出土在泮西以东的遗址，也就是说高领袋足鬲的分布没有突破关中西部。我们知道，何尊铭文已经明确指出，成王五年已“宅兹中国”，假如高领袋足鬲的年代能进入西周，抛开其他遗址不谈，缘何在周公精心营建的成周洛邑都不见一片高领袋足鬲的陶片？作为先周文化最

主要的两类陶鬲之一，为何联裆鬲随处可见，并作为周文化入侵各地最主要的标志，而周人却未将一件高领袋足鬲带入？这或是许多学者不敢轻易同意高领袋足鬲的时代能进入西周的主要原因^[40]。但是石鼓山墓葬发现后，可以帮助解开这一谜团。因为从石鼓山的材料可以看出，高领袋足鬲族群在商末周初似乎主要是向西向北发展，布防于周王朝的西部边境，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这从他们族群在周初的分布可以看出（图三）。

前文在进行葬制、葬俗和器物文化因素对比时可以看出（图二），石鼓山墓葬与隔河的戴家湾墓葬群^[41]十分相似，既有壁龛、无腰坑的共同点，又有典型器物（铜器 + 高领袋足鬲）的高度相似性，即无论葬俗、葬制还是出土物反映的文化面貌都相当的一致。因此石鼓山墓葬群和戴家湾墓葬群属同一墓地，其可能为一个大的族群集团。在这个族群集团内，由于出高领袋足鬲的墓葬等级最高，例如石鼓山 M3、M4，其明显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可以认为该墓地是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导的族群集团。同时，在周人故土我们还可以看到除石鼓山—戴家湾墓地以外的高领袋足鬲族群据点。同在宝鸡的林家村 1983 年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墓^[42]，壁龛内出土 2 件高领袋足以及铜鼎、方座簋。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铜器看，该墓与石鼓山 M3 的时代基本相当，又同样在壁龛内出土高领袋足鬲和铜器，此为高领袋足鬲族群在西周早期的又一高等级贵族分布点。此外，崇信香山寺墓地 1984 年发掘了一座带壁龛、南北向、主要随葬高领袋足鬲的墓葬，该墓发掘者虽然判断为先周晚期，但是据采集到的两件异形联

裆鬲认为该墓地的下限在西周初年^[43]。香山寺墓地位于崇信南部的赤城黑河流域,与位于崇信东北方位汭河流域的西周时期以联裆鬲为主的于家湾墓地一南一北,有理由推测以高领袋足鬲族群为主的香山寺墓地在周初依然分布在这一地区。碾子坡先周时期就是以高领袋足鬲为主的墓地,虽然在西周早期转而以联裆鬲多见,但仍发现有5座随葬高领袋足鬲的墓葬^[44],显然西周初年的古豳地仍生活有高领袋足鬲族群。当然或许宝鸡高家村墓地带壁龕出高领袋足鬲的个别墓葬时代也有可能进入西周,那么其可能为高领袋足鬲族群的又一个据点。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周原以西分布着宝鸡石鼓山一戴家湾、林家村、高家村3个据点,以北东西两侧分布着长武碾子坡、崇信香山寺两个据点。除了出土高领袋足鬲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墓向多南北向,且器物多出自壁龕。种种共同性显示其都归属同样的高领袋足鬲族群集团,且这个族群集团中已知等级最高的宝鸡石鼓山一戴家湾、林家村墓地下限均毫无疑问可至西周早期,等级较低的长武碾子坡、崇信香山寺可延续至周初。从中一是可以看出在商末周初以石鼓山一戴家湾为代表的高领袋足鬲族群集团主要是稳固周人故土,布防周王朝的西部边境,并与豳伯、黑豆嘴部族^[45]、归附的陇县矢族^[46]和灵台漂伯奚伯等^[47]具有军事职能的长官一起严防西北诸戎^[48];二是进入西周后,周王朝似乎更加重视以联裆鬲为代表的族群集团,其高等级墓频现且被分封至各地为诸侯,所以联裆鬲可见于各封国并被作为相关遗址时代进入西周的标尺。而高领袋足鬲族群集团被固守在了西土,已知最东的地点仅在沔西,并且似乎有越来越不受重视的迹象。碾子坡和香山寺一般平民或小贵族墓地在周初的消失似乎就能说明这一问题。而就在周王朝故土先周时期高领袋足鬲分布区的崇信于家湾墓地还转变为以联裆鬲为代表的族群集团,高领袋足鬲族群只有石鼓山M3、林家村M1等高等级贵族才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当然,也或许正是

周王朝对于高领袋足鬲集团的忽视以及对于西土故地防御重视程度的下降,以上族群在西周中晚期仅剩矢族,还在西周中晚期称王^[49]。至穆王时已需西征戎狄,还致“自是荒服者不至”^[50]。虽然西周中晚期接受周王朝统治的秦人在清水、甘谷、礼县一带^[51]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空虚问题,但从现有材料看偏东的地区仍然相当空虚,这或许也是申侯可以联合犬戎完成奇袭的原因之一。以上种种,都为周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在周王朝建立后,对于固守西部边境高领袋足鬲集团的忽视为西周的灭亡留下了隐患。

四、石鼓山 M3 铜器与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关系及该作坊的年代下限

2000~2001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发掘了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遗址^[52],在已发表的2000AGH31材料中,有多件陶范上纹饰与石鼓山M3的铜器近似,甚至有的可以说完全相同。H31:11簋范残高7.5厘米,为一块口沿部分的残片。该范上涡纹旁饰顾首并身体部分简化的夔龙纹,其下饰直棱纹,这样的装饰纹样与石鼓山M3方座簋口沿部分纹饰近乎相同。H31:14卣范残高8.4厘米,为卣的腹部,纹饰是大鸟纹的尾部。尾部上三根立羽的独特装饰与户卣、户彝腹部大鸟纹相同。H31:15卣范残高6.5厘米,为卣的腹部。其三叉尾状纹饰位于直棱纹之下,又在大鸟纹的冠部,形制和位置与M3两件户卣、一件单父丁卣的腹部相同。H31:18兽首范直径11.3~11.9厘米,是一块比较完整的陶范,应为器物提梁两侧的铺首。其上兽首,特别是两个造型夸张的“鸭掌形”角与M3户卣乙提梁两侧的铺首装饰近乎一致,仅有两“鸭掌形”角张开角度和其内鸭掌“脚趾”下纹饰的细微差别。此外,与户卣甲、方彝除以上差别外,仅有兽首眼部有眉和无眉的差别。H31:6器座范残高8.4、残宽18厘米,应为方禁的短侧或者小方座的正面。其



图四 石鼓山 M3 铜器与孝民屯东南地 2000AGH31 陶范对比图

上纹饰与 M3 方禁短侧装饰极为相似，都是直棱纹下饰以云雷纹衬底的两两相对的夔龙纹，两侧边缘饰站立的云雷纹衬底的夔纹，区别仅在于相隔两相对夔龙纹的扉棱形状及站立状的夔纹（图四）。此外，孝民屯 2000AGT14 扩②：2、2000AHT14 ③：32 鼎范^[53]直棱纹下饰三角纹的特点与 M3 扉棱鼎下腹纹饰近同，孝民屯 H31：7、8 簋范上下乳钉纹中间直棱纹的装饰与石鼓山 M4 四耳簋腹部^[54]近同。以上都是石鼓山墓葬铜器上非常有特点的装饰纹样，类似纹饰也基本只发现于戴家湾铜器群。这些特征明显且发现于石鼓山—戴家湾墓地的铜器与孝民屯东南地陶范如此近似，乃至相同，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该如何解释？

假如理解为武王克商后西土集团对于殷人的掠夺，也就是《尚书》所记的“分器”，似乎可以简单迅速解决两者的关系问题。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其难以自圆。因为虽然类似陶范发现于殷墟，但迄今为止这样的铜器基本只在石鼓山—戴家湾墓地有所发现^[55]。如是“分器”，显然认定这批铜器的主人为殷遗贵族或者其亲族，然殷墟的考古工作已开展 80 多年，却从未在殷墟任何一座墓葬发现过任何一件类似鸭掌形角铺首与三叉尾状冠立羽大鸟纹同时存在以及类似后者鸟纹的铜器。文献也并无武王克商后盗掘甚至毁坏殷商贵族甚至商王陵的记载，考古多年的工作也未发现类似迹象。既然铜器主人为殷商贵族，那么其在克商前就应长期居住在殷墟，死后的墓葬也应在当地，而周王朝即便“分器”也不可能将墓葬中的类似铜器洗劫一空。此外，从这类铜器的年代上看，虽然我们认为是周初，但是也不敢完全排除早至商末的可能，因为类似方彝的直腹、圈足微撇的特点在商末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都有存在。但是 2 件户贞及 1 件单父丁卣的时代不可能早到商代。这 2 件户贞都是垂腹明显，形制比高家堡成康时期墓葬 M2：4 铜卣还要略晚，与竹园沟康昭时期墓葬出土的 M7：6 伯格卣近似，仅圈足下小台略高。那么既是“分器”何以会是西周早期的铜器？况且多件可能在孝民屯东南地的出土，作坊铸造的铜器中还有西土风格的铜器，所以原因当另寻。我们认为类似陶范在孝民屯东南地的出土，很可能是该铸铜作坊在武王克商后为周王朝所控制，并开始为



图五 武功梁家堡先周墓列鼎（摘自张懋镛：《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

周王室所服务的结果。商周乃至后代，手工业者都是特殊人群，即便被俘也不会处死，而是继续为新的王朝服务。由于高领袋足鬲族群在先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其最高级贵族很可能也享有该作坊的产品，利用殷人在铸铜方面的高超技术去铸造符合自己族群风格的铜器。至于简报中提到的该作坊内无西周时期文化遗物的现象，应是指不见周因素遗物出土，但该铸铜作坊的一些商式陶器的时代可能已进入西周。我们知道王朝的更替无法将文化的传承一刀切断。况《左传》定公四年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此地西周初本就有殷遗民。同时，作为手工业者这类特殊人群，在周初仍然使用此前的生活陶器也是很正常的。而这种现象目前在环渤海沿岸的制盐作坊亦有发现，他们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仍在用部分典型的商式陶器。此外，像2000AGH31陶簋、瓮、罐在诸如前掌大墓地西周早期的墓葬里都有出土^[56]，此类器形可延用至西周也是有多个地点的证据可循。最后，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内西土风格铜器范的出土，如四耳菱格乳钉纹簋（2000AGH31 7、8 簋范）^[57]也可佐证该作坊的时代已进入西周。况在殷末商周关系紧张的情形下，商人是不可能用自己的作坊为周人铸

造铜器，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克商之后。因此，我们同意此前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时代当进入了西周^[58]。同时进一步认为其在周初是为周王室服务的，并有一部分可能是为石鼓山高领袋足鬲族群集团服务。

五、西周列簋制度的雏形

西周时期的列鼎、列簋制度，学界一般认为是在西周中晚期形成的。但是武功梁家堡先周墓葬3件大小相次、形制纹饰相同的铜鼎的出土（图五），证明列鼎制度的形成可能要早至商末^[59]，而且最早发生在“西土”。列簋制度出现的最早墓葬材料，一般认为是曲村M6080和M6081。这两座墓葬分别出土2件一组的大小、形制、纹饰近同的菱格乳钉纹簋，时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60]。此次在石鼓山M3的K2，出土了3件大小、形制、纹饰接近的菱格乳钉纹簋，并且这3件出土时还套在一起放置，说明其为一组铜簋无疑。而时代相对略早的石鼓山M4也同样在同一龕内出土了3件相套的菱格乳钉纹簋^[61]。列鼎一般是成奇数，而列簋是成偶数的；列鼎是大小相次，列簋是大小基本相同。K2的3件大小、形制、纹饰近同的特点，均与列簋的要求吻合，惟同龕只有3件成奇数略有差别。但若与相邻的K1出土的1件形制、纹饰接近的菱格乳钉纹簋组合在一起，正好构成一套4件（图六）。虽然其分属不同壁龕，但仍属同一墓葬，这一发现说明列簋制度早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已经形成，而且无论从所出土墓葬的族属或尖刺状菱格乳钉的



图六 石鼓山M3列簋

M3 : 3 (K2) M3 : 7 (K2) M3 : 9 (K2) M3 : 8 (K1)

装饰特点都反映族属为西土集团，且最早发生在“西土”。至于同一壁龕只有3件相套的特点，说明列簋制度在这一时期还处在刚刚发生的阶段，还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无论如何，最低程度都可视为列簋制度的雏形。

六、结语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石鼓山 M3 的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由于 K3、K6 内有多件铜器相当于成康时期，因此墓葬的下限可能会进入康王初期。墓葬的葬制、葬俗以及出土器物都展现出了浓郁的“西土”风格，墓葬等级也明显高于同时期的殷遗墓，因此应属仅次于诸侯一级的“西土”高等级贵族。至于墓主身份，由于铜器上族徽反映出的族系关系十分复杂，尚难定论，待石鼓山墓地材料全部公布时再做讨论。此外，石鼓山 M3 的铜器、葬制、葬俗等特点体现出与隔河相对的戴家湾墓葬群可能属同一墓地。其与特征相似、等级接近的林家村墓地以及等级较低的宝鸡高家村、长武碾子坡、崇信香山寺共同显示出高领袋足鬲族群在商末周初主要向周人故土发展，布防西部边境，而联裆鬲集团主要向关东发展的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关东地区西周时期不见高领袋足鬲的迹象。同时，在进入西周后，周王朝越来越重视联裆鬲族群集团，而对于固守西部边境的高领袋足鬲集团逐渐忽视，以致为西周灭亡埋下了隐患。而石鼓山 M3 部分典型铜器与孝民屯东南地陶范的近同，说明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以及其手工业者在周初继续为西土集团高等级阶层服务，2000AGH31 等单位的时代下限可进入西周。同时，石鼓山 M3 还提供了已知最早的列簋制度的墓葬材料，展现了西土集团列簋制度的雏形。

[1] a. 石鼓山考古队.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J]. 考古与文物, 2013(1). b.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 2013(2).

- [2] a. 王颢, 刘栋, 辛怡华. 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J]. 文物, 2013(2). b. 辛怡华, 王颢, 刘栋. 石鼓山西周墓葬出土铜器初探[J]. 文物, 2013(3). c. 张懋镕. 宝鸡石鼓山墓地文化因素分析[C] //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四).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d. 李学勤. 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J]. 文物, 2013(4). e. 彭曦. 蠡测石鼓山西周早期M3主人[J]. 宝鸡社会科学, 2013(3). f. 张天恩. 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J]. 文物, 2015(1).
- [3] a. 王占奎. 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C] // 中国考古学会.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材料, 2014. b. 周野鹿鸣[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 长安沔西西周墓葬发掘记略[J]. 考古, 1984(9).
- [5] 滕州市博物馆. 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C]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岱考古(第三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6] 王世民, 陈公柔, 张长寿.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7] 安阳市文物考古所. 河南安阳榕树湾一号商墓[J]. 考古, 2009(5).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 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 考古, 1990(1).
- [9] 宝鸡市博物馆. 宝鸡虢国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 [11] 宝鸡市考古所. 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简报[J]. 文物, 2007(8).
- [12] 陈公柔, 张长寿. 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J]. 考古学报, 1984(3).
- [13] 雷兴山. 先周文化探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14] 雍城考古队.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J]. 考古与文物, 1982(4).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邠州·碾子坡[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 [16] 数据引自《南邠州·碾子坡》, 但是不排除报告所划分的这68座墓中M162、M1101、M1168三座随葬联裆鬲的墓时代晚至周初的可能。
- [17] a.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宝鸡市高家村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8(4). b. 陕西宝鸡高家村刘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C] //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7),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 [18] 陕西省博物馆,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J]. 考古, 1976(1).
- [19] 由于该墓遭盗扰, 未出随葬品, 故时代难以判断, 暂置先周末期, 材料见于: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发掘报告[C] // 文物资料丛刊(8).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20] 陶荣. 甘肃崇信香山寺先周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8(2).
- [21] 同[10].
- [2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高家堡戈国墓[M]. 西安: 三秦出

- 版社, 1994.
- [23]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J]. 考古学报, 1977(2).
- [24] 同 [9].
- [25] 武者章. 先周青铜器试探 [J].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989(109).
- [26] 曹斌. 商周铜器研究 [J]. 考古与文物, 2011(3).
- [27] 张明东. 略论商周时期的毁兵葬俗 [J]. 中国历史文物, 2005(4).
- [28]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西周夔纹铜禁 [J]. 文物, 1975(3).
- [29] 陈梦家.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2.
- [30] 同 [29].
- [31] 陈佩芬.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32] a. 孙机. 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 [J]. 文物, 1985(8).
b. 吴晓筠. 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 [C] //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 (第1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c. 邹衡. 论先周文化 [C] //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33] 同 [2]a.
- [34] 李伯谦. 举族族氏考 [J]. 考古与文物, 1987(1).
- [35] 李零. 苏埠屯的“亚齐”铜器 [J]. 文物天地, 1992(6).
- [36] “余其 遣告侯田册 方、羌方、羞方……” (续 3. 13. 1)
- [37] 俞伟超. 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一俾一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38] 同 [31].
- [39] 郭家庄 M160 铜尊 (M160 : 52) 肩部有“鸭掌形”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 1982-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但兽首与孝民屯作坊陶范差别很大, 也与石鼓山一戴家湾兽首差别较大. 同时, 殷墟不见鸭掌形角兽首与三叉尾状冠立羽大鸟纹同时存在的铜器, 且不见单独的三叉尾状冠立羽大鸟纹.
- [40] 张天恩先生在与笔者讨论时, 提及此观点.
- [41] a. 刘明科. 党玉琨盗掘斗鸡台 (戴家湾) 文物的调查报告 [C] // 刘明科. 宝鸡考古撷萃.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b. 苏秉琦. 苏秉琦文集 (1) ·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42] 宝鸡县博物馆. 宝鸡林家村出土西周青铜器和陶器 [J]. 文物, 1988(6).
- [43] 同 [20]. 香山寺 84CXMI 同出有 1 件小口圆肩罐 (M1:5), 该类罐在张家坡墓地的时代已经进入西周, 因此也不排除香山寺 M1 的时代进入西周的可能.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郊州·碾子坡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 [45] 淳化县文化馆. 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J]. 考古与文物, 1986(5).
- [46] 卢连成, 尹盛平. 古欠国遗址、墓地调查记 [J]. 文物, 1982(2).
- [47] 渔国墓地甚至有学者将其和太伯奔荆蛮相联系, 因此其性质暂且不论.
- [48] 这些墓地多出土有象征军事权力的大铜钺, 且各有自身特点, 或许表明他们在周初多为军事首长.
- [49] 有多件西周中晚期的矢王铜器发现, 甚至有的可早至西周早期.
- [50] 《国语·周语上》: “穆王将征犬戎, 祭公谋父谏曰: ‘不可……’ 王不听, 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自是荒服不至.” 《后汉书·西羌传》同样记此战事, 但是对于结果的记载有所不同. 其曰: “至穆王时, 戎狄不贡, 王乃西征犬戎, 获其五王, 又得四白鹿、四白狼, 王遂迁戎于太原.”
- [51] a.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 [N]. 中国文物报, 2012-1-20(8). b.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1987(3). c.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 [C]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古代文明 (7).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2006(3).
- [53] 李永迪等. 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 [J]. 考古, 2007(3). 此外, 孝民屯东南地陶范与戴家湾铜器的关系可参看该文.
- [54] 同 [3].
- [55] 类似出在其他地点的只有梁带村 M27 出土的一件铜卣 (M27:1021), 该卣兽首形铺首上饰“鸭掌形”角, 腹部饰与石鼓山 M4 球腹簋腹部纹饰相同的花冠凤鸟纹. 该墓时代为春秋早期, 但是墓中除此件卣外, 还出土有多件西周早中期铜器, 因此流布原因还有待探讨. 材料详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M27 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07(6).
- [56] 曹斌. 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J]. 考古与文物 (待刊).
- [57] 对于该件陶范的分析, 我们采用发掘者和整理者 (李永迪、岳占伟、刘煜) 的说法.
- [58] a. 内田纯子. 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 [C]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与商文化: 殷墟科学发掘 80 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b. 路国权. 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 [J]. 考古, 2011(8).
- [59] 张懋镕.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土青铜器谈起 [J]. 考古与文物, 2009(1).
- [60]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 天马——曲村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61] 同 [3].

(责任编辑 李自智)